中法建交背景及原因浅析

李军[1]，周小军[2]，华岚[2]，唐小玲[2]

（1. 外交学院 外语系，北京 100037；2.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摘要] 中法两国作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里的重要角色，于 1964年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国建交，不仅是国内政治及谋求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需要，亦是当时国际局势和环境影响下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中法建交；背景；原因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5）02-0014-05

1964年 1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而建国 15年后的中国也第一次与西方大国有了直接的对话。中法两国建交，有力地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打破了美国长期孤立中国、制造“一中一台”的图谋，开创了两个不同意识形态大国求同存异、合作发展的典范。邓小平同志 1975年访问法国时曾讲，把中法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到的多得多[1](P.24)。本文将从中法建交前的那段历史时期内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外交政策等方面分析论述中法两国建交的背景和原因。

一、中法两国的国情和对外政策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中国和法国这两个饱受战火创伤的国家在励精图治、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适合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断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抗美苏的霸权主义，并最终走到一起，确立了各自的大国地位。这既是两国政治、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当时国际背景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法国方面

1945年，二战结束，巴黎光复，组织和领导全国民族解放阵线坚持抗战的戴高乐将军被推举为临时政府总理。然而，由于戴高乐将军提出的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计划不为左派所接受，他于 1946年 1月辞职，回到家乡科隆贝教堂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战后，法国进入了重建和经济发展时期。为了有效地刺激经济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手段，但第四共和国实行的多党议会制导致政府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无休止的殖民战争，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和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使国库耗空，民心渐失。1958年 1月，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将领马絮（Jacques Massu）公开叛乱，全国处于混乱状态。危难之际，法国总统勒内·科蒂（Rene Coty）请出戴高乐组织政府，挽救危局。戴高乐接受授权组织新政府后，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殖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将领叛乱，稳定了国内局势。1958年10月经全民公决投票通过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废除了第四共和国多党议会制，实行总统制。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戴高乐于1959年1月8日宣誓就任总统。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及组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了对西欧政治和军事的控制。为了防止战争、发展经济、遏制苏联、制约美国，西欧各国逐渐走向了联合的道路。1947年3月4日，英法两国在法国的敦刻尔克（Dunkirk）签订了《英法同盟互助条约》，共同承担应对德国威胁的义务。1950年，在舒曼计划倡导下，法国、联邦德国等6国于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各国由此走向联合一体化的道路。为了对付苏联及“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依靠美国、联合欧洲的政策，将自己置于“北约”集团的保护之下。

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和戴高乐执政初期，一直奉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对华政策。这一时期，法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美军和北约的一些军事指挥机构和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等都设在法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法国经常把中国与苏联扩张主义相提并论，攻击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与中国发生了冲突。

在平定了国内局势后，戴高乐开始在外交领域积极推行谋求法国大国地位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统治，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组织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第三力量，重新确立法国的大国作用。基于这一指导方针，戴高乐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确立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下令加速核武器研制开发工作，1960年2月13日获得成功；接受《罗马条约》，积极支持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六国共同体的基础上组建以法国为领导的西欧集团；反对美国霸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而不退出北约；实行非殖民化，奉行积极的第三世界政策。

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戴高乐逐渐意识到，要使法国在全球获得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他认为，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2](P.677)。随着中国不断以大国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戴高乐对中国的新认识也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整个中国都集合在中国政府之下，它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3](P.494)；中国是亚洲的重要力量，法国想重返东南亚，倡导东南亚地区中立化，就不能避开中国，法国“必须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通过与中国的直接对话，法国可以借助中国制约美国，推动越南战争取得其希望的政治解决，以利于法国重返这一地区。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也为法中关系正常化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二）中国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不仅拒不承认，而且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军事包围乃至武装侵略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际，毛主席代表中央政府向世界各国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4](P.116)新中国成立后采用了毛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项重要方针。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原则。1953年底，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得到了印度、缅甸等国的支持，并共同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了中国愿意在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一切国家发展平等友好关系的决心。

为了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的敌视、封锁政策，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之内，并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峰，至1955年底，中国先后同23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外交关系。

美国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台湾、阻挠中国统一之外，还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于 1950年 6月 27日宣布美国海、空军给南朝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面对美国武装入侵的危险，中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1950年 10月 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帮助朝鲜人民对抗美国的军事侵略并于 1953年 10月取得胜利。这不仅粉碎了美国企图用武力吞并朝鲜半岛和扼杀新中国的阴谋，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独立的决心和实力。

新中国建国初期，苏联给予了中国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然而，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争霸的局面愈演愈烈，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气与日俱增，力图将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之中，这是主张自己独立外交政策的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两国的分歧逐渐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最终在1959年尖锐化。1959年 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 1957年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1960年又变本加厉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此举给中国的经济、国防、科研等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后，中苏两国的矛盾迅速公开化，并在边境地区发生多次冲突，两国在国际论坛上也公开翻脸。

此时的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际上又面临着与两个超级大国交恶的危险，急需寻求其它大国的承认与支持，恰逢此时，戴高乐派出富尔访华，探寻建交的可能性。以此为契机，两国终于走向了合作。

二、中法建交原因分析

回顾建交前的国际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法国曾分别是斗争激烈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双方长期抱有不理解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两个原本互相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在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各自国内的形势与对外战略需要，由对抗走向联合，主要原因如下：

（一）反对霸权主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63年底，周总理接见富尔谈到中法之间的共同点时说："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因为我们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达成协议，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5](P.360)随着冷战的发展，作为两极的美国、苏联在各自的集团内越来越以领导者自居，要求集团中的其它国家服从于自己的对外政策，以利于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争霸行动。这必然会引起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的不满，其中，法国与中国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一方面，法国在北约中不断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最终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另一方面，中国不满苏联大国主义，不听从"老大哥"指挥棒直至公开脱离苏联的轨道。中法两国谋求独立自主外交地位，反对美苏霸权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特别是反对和抵制美苏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6](P.224)

（二）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举措

戴高乐上台后，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提出经济上、政治上以至防务上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反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统治：积极建立自己的独立核力量，为其大国地位和执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提供保证；联合西德组建欧洲共同体，力图组建以法国为领导的西欧集团，以制约美国在北约内的霸权统治；对苏联实行"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同苏联进行直接对话。作为其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与中国建交，有利于法国重返东南亚，对印度支那和远东地区事务施加影响。中法建交后，法国成为了唯一一个与美、苏、中三大力量都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加强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提升了其战略地位。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和敌视，中国在外交上对西方阵营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打破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封锁，从而争取西方阵营中的西欧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中法建交标志着这一战略目标取得了巨大突破，也为其后多个西欧国家与中国建交做出了榜样。

（三）文化交流的良好基础

中法两国虽然相距万里，远悬欧亚大陆两端，但两国人民各自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是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文化大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传统友谊。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远比政治关系悠久。法国的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罗丹等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早就为中国人民所熟知。1789年法国人民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许多尚在黑暗中探求中国前途的革命家深受启发。法国人民也通过中国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先贤和四大发明、丝绸之路等了解了中国厚重隽永的古代文明。1861年，大文豪雨果曾写信抨击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行径。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33年发表的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小说《人类的处境》曾获得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龚古尔奖。邓小平、徐悲鸿、冼星海以及直接主导中法建交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国20世纪的一大批著名政治家、艺术家都曾在法国学习、生活。力主与中国建交的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文化亦十分关注，称赞中国是“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7](P.230)的文明古国。可以说，文化交流已经在中法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沟通之桥、理解之桥、友谊之桥。

（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在当时意识形态主导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勇敢地与敌对阵营内的国家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是与中法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及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分不开的。为了顺利与中国建交，戴高乐排除了法国国内和美国的各种干扰，在1964年1月8日召开的讨论中法建交问题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讲道：“中国这个事实明摆在那里。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拥有开辟未来的一切手段。我们不清楚，它需要多长时间来发展自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大国”。“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特别是为了在东南亚实现和平，使法国能够重返这一地区……”。“我们在中国存在，我们的文化并不使中国人感到讨厌，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扩大在那里的文化影响，世界上将会有更多讲法语的人”。[8](P.32)中国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中法建交，富尔作为戴高乐的密使访华寻求建交时，毛主席、周总理多次会见他，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使他“深受鼓舞”。毛主席会见富尔时曾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明了中法两国关系的利害。毛主席十分赞赏戴高乐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称赞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周总理亲自主持中法建交谈判。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对中法关系的共同重视保证了两国建交谈判的顺利进行，较好地解决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三、中法建交

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并完成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后，戴高乐开始在外交领域积极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霸权统治，使法国从美国的统治下挣脱出来。法国反对霸权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赢得了中国的赞赏。

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了百年战乱后终于找到了通向富强的道路，正以大国的形象进入国际舞台。虽然新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政治、经济上的困难，但中国人民对和平、独立的追求从未改变。中国人民为获得民族独立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为维护国家主权而与美国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在东方阵营中反对苏联的霸权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都使法国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必将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国想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反对美苏霸权，在其传统势力范围东南亚施加影响，离不开中国的配合与支持。

正如戴高乐所说，“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8](P.40)。

1963年 10月 22日，作为戴高乐代表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到达北京，受到了中方的热情接待。富尔在中国进行的半官方“旅行”期间，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北京、上海共进行了 6次实质性会谈，双方都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4年 1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中法两国建交，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史学家们形容为“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9](P.122)。中法建交不仅仅是两国从各自立场出发反对霸权、谋求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重要外交举措，同时也是影响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戴高乐曾在 1964年 1月 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非常自信地说：“法国承认中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他相信目前某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3](P.495)。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中法建交，已经成为 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中极为精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刘海星，高风．中法建交四十年重要文献汇编[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2] [美]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M]．西安外语学院．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 国际关系研究所．戴高乐言论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4]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5]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6] 张锡昌．中法建交四十年再回首[A]．黄舍骄．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7]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8] 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A]．黄舍骄．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9] 王惠．新中国外交[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10] 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 [法]马蒂耶．法国史[M]．郑德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齐琳)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